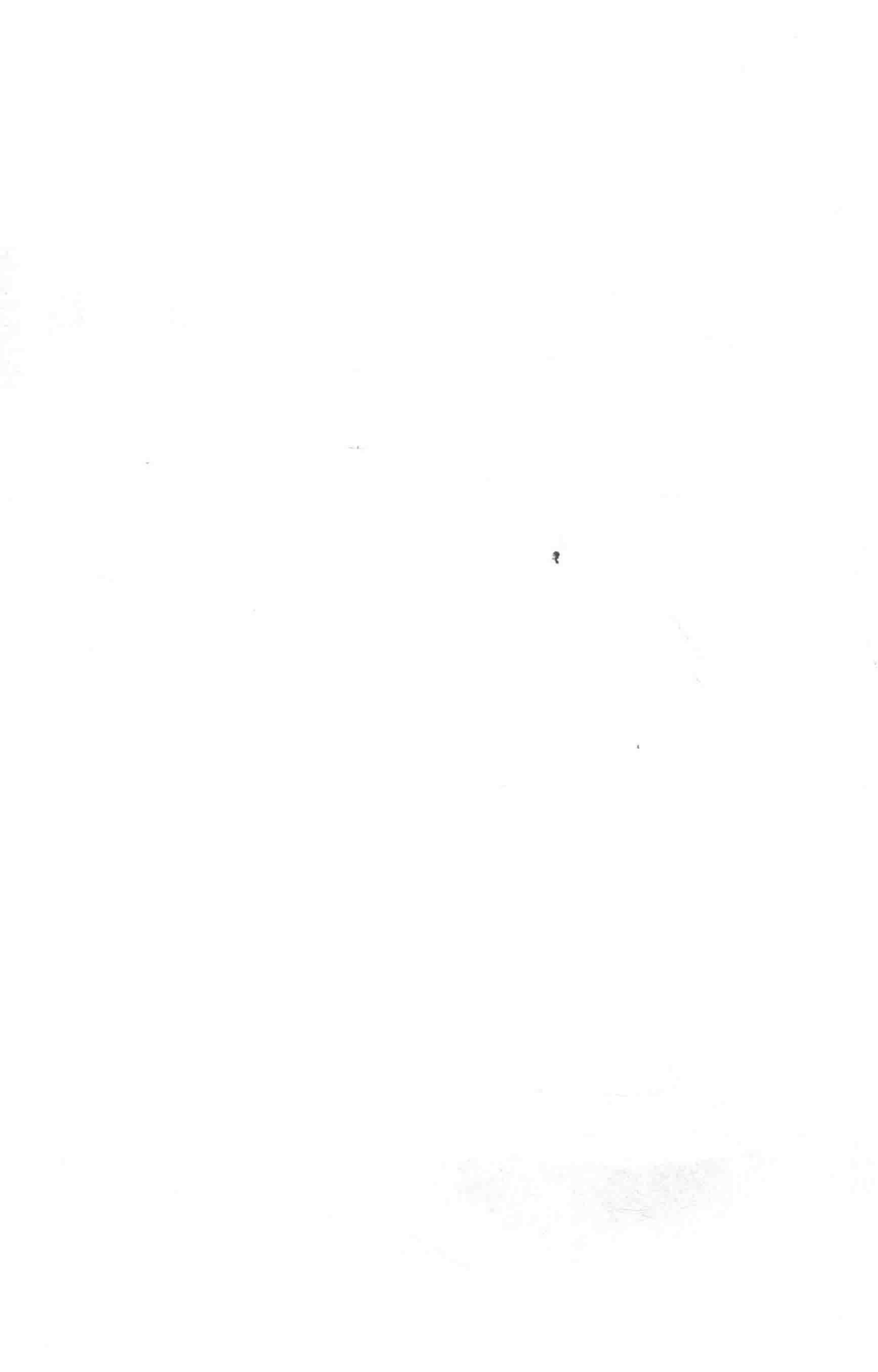


上 篇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界问题研究刍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始皇建立中央封建集权国家以来，悠悠两千余载，在中国辽阔大地上出现过多次大一统局面。秦汉时期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加强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宋、辽、金之际，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与交流进一步发展。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使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长达百年的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在清代前期，清朝政府在元、明两代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统一，基本形成了现今的疆域范围。消除边疆地区的割据势力和抵御外侮，成为这一时期边政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战乱、有分裂，但每次战乱与分裂，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有规律，已日益为研究者所认识，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开展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作出进一步认识。

研究边疆政策，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边疆”？简言之，边疆就是指直接与国界相关联的地区。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界和边疆，但有些国家的边疆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界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形成具有自己历史发展特色的边疆地区；另一些国家则不同，它们的边疆地区，从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与该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属此列。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

衰更迭，王朝的统辖范围屡有变迁。因此，我们所指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区，不是固定不变的，及至清代，清朝政府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了现今幅员辽阔的疆域格局。清代的边疆地区已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我国的沿海诸省，以及台湾岛、海南岛（包括南海诸岛），则无论古今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清代以前的边疆，则应参照历代王朝管辖的实际情况，作实事求是的认定与考察。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明诸一统王朝的充实、完善，至清代形成了完整体系。历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各朝各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时至今日，古代边疆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来说也是一份有待认真总结、批判继承的重要的历史遗产。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概言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怎样守住一条线，管好一片地。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为人们提供了众多的研究层面，其重要方面至少有：

（1）历代边疆政策的综合研究，包括陆疆政策研究与海疆政策研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中不同政权的边疆政策研究；

（2）边疆政策中一些有共性问题的专题研究，诸如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等研究；

（3）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以及与边界交涉有关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4）边疆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之一——传统治边思想研究；

（5）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

（6）边疆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研究；

（7）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的研究与考证；

（8）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研究；

总之，这是一个可供研究者大有作为的广阔研究领域。

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有关学者，完成了

四个研究课题，成果分别是：

(1)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珩、马大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3) 《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①；

(4) 《康、雍、乾与北部边疆》(袁森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②。

已着手组织进行的研究课题有：《中国边疆管理机构沿革史》《安西与北庭——唐代的西北边务》《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等。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日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有深度的研究新成果将会不断面世。

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应该有更多研究力量的投入。当代边疆问题，至少包含三个研究层面：一是研究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国际上有关边疆、边界的理论，进而建立我们自己的边疆、边界理论体系；二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成就和存在问题；三是针对当代边疆的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

当代边疆问题可供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重要者至少有：

- (1) 边疆和边界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
- (2) 边疆政权建设（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研究对象）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
- (3) 边防工作研究；
- (4) 边界交涉研究；
- (5) 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研究；
- (6) 周边邻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研究；

① 本书1994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 本书1991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7) 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和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上述第二至第六方面问题研究。

显然,这将又是一个亟待有志者去开拓的研究新领域。

仅以边界交涉为例,再作阐述。中国当代边界问题,主要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本着公平、合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先后与缅甸(1960年10月)、蒙古(1962年12月)、尼泊尔(1961年10月)、巴基斯坦(1963年3月)、阿富汗(1963年11月)等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睦邻友好是我国与邻国关系的主流。但毋庸讳言,由陆地边界问题引发的争端也时有发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捍卫领土主权,在边界地区曾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自卫反击战: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9年中苏边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9年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在我国辽阔的海疆,围绕海疆划界问题,也存在双边或多边的争端,诸如,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归属的争端、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争端、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以及为捍卫南沙群岛主权而进行的多边交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学者去探求原委,总结经验。西方学者早已将自己的研究视点投向当代中国边界问题,人们熟悉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即著名一例,类似著作还有很多。可直至今日,我国学者只发表了为数有限的一些研究论文,出版了几本通俗性的小册子,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和资料汇集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流传。苏联学者所作的有关中苏边界的论著在全世界以多个语种大量发行,越南、朝鲜的学者也不甘落后。相比之下,我国学术界除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沙俄侵华史研究上有所进展外,研究的总趋向是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且受非学术因素的制约极大。

其实,当代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学术界可做的工作很多,既可以进行回顾性研究,还应该进行超前性研究。笔者以为,至少下述几方面工作应尽快组织力量付诸实践:

其一,搜集、整理中外各国有关我国边界问题的政府文件、档案文献,以及边疆考察报告;

其二,有计划、逐步地进行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参加边界工作当事人回忆资料的收集、整理;

其三,研究我国与邻国边界交涉的由来和发展;

其四,重点研究有争议的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边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并提出解决问题或应付突发事件的对策性研究报告;

其五,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界谈判和自卫反击战的经验与教训;

其六,有步骤地开展边界地区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考察。

总之,面对动荡多变的当今世界、复杂微妙的边界现状、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中国边疆史地工作者们将直面当代中国边界的诸多问题,通力合作,进行创造性、超前性研究。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得到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更多的提倡、更有力的支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囿于人力和财力,目前除了正在主持撰写《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3卷本)和开展当代边疆问题系列调查外,还正在筹划《中国近代界务研究丛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

要推动中国边疆政策与当代边界问题研究,还必须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第一,关于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由于40余年来学术界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分别纳入断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边缘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具有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学者们孜孜不倦地研究古代封建王朝的民族统治政策、清王朝的喇嘛教政策,而极少从治理边疆的高度与广度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政策,究其缘由,主要是没能将边疆治理作为研究客体来考察、研究。因此,改变边疆史地研究长期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使边疆史地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的客体,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唯此,我们才有可能提出并组织力量进行关于边疆史地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边疆学概论”“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疆研究史”“边政史鉴”等。

第二,关于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应将两者等同。研究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当然,研究者也应发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真务实

的优良传统，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我们以为，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要区别研究与决策的不同内涵，真正做到把研究者的观点作为学者的观点来对待，切不可把研究者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唯此，研究者才可能在边疆史地这一颇具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进行大胆的探索，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也就为期不远了。

解析

本文原是1990年11月6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整理成文，加了题目，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些充实，刊登于《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作出进一步认识；而面对动荡多变的当今世界，中国边疆史地工作者更应直面当代中国边界的诸多问题，通力合作，进行创造性、超前性研究。本文还提出在研究中必须注意处理好研究客体与从属关系、研究与决策的关系。这是我刊发的第一篇有关研究中国边疆政策的论文，并在本文中明确提出研究中国边疆政策要贯通古今，关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1987年后着力提倡开展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在中国疆域史研究领域首选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口，为此，1988年至1990年，我先后主持并完成了三个课题，成果分别为：

- (1)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
- (2) 《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
- (3)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珩、马大正主编)；

上述三部著作都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选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公开出版，这三部专题性学术论集因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领域中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价值而为几代学人所关注。在上述三部著作中，我设计了总体框架，组织了作者队伍，还撰写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综述》，合撰了《清代的边疆政

策·导论》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概述》，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当年我从事中国边疆政策研究形成的一些认识的归纳和提炼。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再读，一些基本论述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一、中国的边疆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一般把边疆解释为“靠近国界的地方”“边境之地”，或是“一个国家边远的地区”。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只有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被称为陆疆地区：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严格来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省区都视为陆疆地区。因为内蒙古自治区虽然从人文方面看是蒙古族普遍居住的地区，从历史方面看也有其发展的整体性和特殊性，但阴山山脉横亘其间，使山南与山北地区在自然条件、历史与人文特点和发展水平方面，实际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将阴山山脉以北地区作为边疆地区，并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完整性，把横跨阴山山脉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也都作为边疆地区，是较为适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深入内地的桂林、梧州地区，亦不应作为边疆地区。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市及其周缘地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和集安市以外地区，辽宁省丹东地区以外地区和云南省沿国境线诸州和地区以外地区，亦不应被视为边疆地区。简言之，凡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顺便提及，在当今人们的习惯中，也有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

贵州等省称为“边疆地区”的，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边远地区”，但不能称之为“边疆地区”，因这些省区均不具备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

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出现过多次大一统局面。秦汉王朝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宋、辽、金之际，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进一步发展；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长达百年的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清政府在元、明两代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清初内地划分 18 省，即直隶、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陕西、甘肃。其中，云南、广西，以及台湾、海南岛和南海诸岛虽划入 18 省，但地处边陲，与邻国接壤，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与内地有所区别；所以清代边疆包括：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

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有战乱，有分裂，但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在讨论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其次是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考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这就是说，当代的中国边疆与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但当代的中国边疆又不能与历史上的中国边疆简单地画等号，因为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着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综合现有的认识，海疆可以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域，这是国家的内海，其法律地位与领土完全相同；二是按当今公认的国际法，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国家的管辖海域和岛屿。据上述标准，中国的海疆，从鸭绿江

口到曾母暗沙有4000余公里，东西宽约700~1600公里；中国大陆边缘，除渤海为中国的内海外，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所以中国海疆按海区划分为黄海海疆、东海海疆和南海海疆。在上述海疆中，最大的岛屿有台湾和海南（已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省份），但在论及历史上的海疆时还必须考虑到拥有大陆海岸线的省区的客观实际。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第一，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形式往往呈现两种状况：一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管制；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于在某地实施哪种方式，则要因地制宜或因时而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在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

第二，边疆有军事方面的含义。边疆地区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因此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在国家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或武装侵略时其作用就更为突出。

第三，边疆有经济方面的含义。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方面往往与内地有较大的差别。

第四，边疆也有文化方面的含义。正是因为边疆地区在以上诸方面往往与内地有不少差异，所以其区域文化类型的形成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长时期、深层次演进的结果，与边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主要是民族或种族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与外部的文化交流（主要是边疆与内地的交流）中，其社会文化特点也会发生变化。

显然，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从历史角度看，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族自治的本质和形式有别，如在古代有羁縻府州、土司地方等）属于边疆地区，但也不能就此得出自治程度高的地区就是边疆地区的结论。

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有着广袤的疆土和众多国民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

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当代状态的。边疆地区的发展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发展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基础，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也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势，或者是到当代为止的归宿：其一，原为边疆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有反复的发展，逐步变为内地的一部分；其二，曾是域外或边疆的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有反复的发展，现在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其三，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是中国边疆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成为我国域外之地。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会涉及以上三种情况的中国边疆。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的发展大趋势，那么结论只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统一，终使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其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辨析中国边疆的历史特点，对于加深理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作简要的概述，中国边疆至少有以下特点：

第一，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领土的統一的多民族国家，其边疆地区地域亦十分广阔。从东北到西南，陆地边疆地区面积即超过全国面积的一半，此外还有十分辽阔的海疆。中国各边疆地区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往往存有巨大的差异，中国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讲分散，既指从全国角度看边疆分散为若干地区，也指在一个大的地区中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讲统一，既指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指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的演进。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史，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东北边疆地区，该地处于东北亚一隅，东有海，西有大兴安岭山脉，北至东北西北部高寒地区，南则与华北地区相接。该地区有漫长的地区社会发展史，与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有联系，但更主要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东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的辖治有着时进时退的变迁，当契丹、女真

(及后来的满洲)在该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后,该地区作为中国辽阔边疆一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北部边疆地区,主要是蒙古高原地区。这里地势开阔,适于牧业发展,但也时遇恶劣气候造成的天灾。该地区的经济以游牧为主,社会发展波动性较强,居民流动性亦强。该地区自古就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战争、和亲、经贸人员交往及移民潮,都是连接纽带。当蒙古族在这一地区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后,该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的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然,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与东北边疆地区、西北边疆地区的发展也有多方面的联系。西北边疆地区,这里地域广袤,但间有高山、荒漠分隔;行路漫长而艰辛,但又是东亚至中亚及南亚、西亚、欧洲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这就导致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的局面,但各地区在分散发展基础上的统一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西部边疆地区,主要是青藏高原地区,高山大川的阻隔延迟了该地区统一发展的进程,但自吐蕃在此兴起以后,该地区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日益加深的多方面的双向交流最终导致这里成为中国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南边疆地区,热带、亚热带高原、平坝地形更加复杂,自然环境也为小规模人群提供了小范围的生存空间,这里的居民有着漫长的与外世相对隔绝的发展进程,但是,缓慢而坚实、少有反复的统一历程则代表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继实现了地区性统一的南诏、大理兴起之后,统一于中国版图的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已稳定地融于中国发展的历程之中。在南部沿海及海岛(主要有台湾岛和海南岛)地区,也有着边疆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和逐步融于全国性发展进程的发展历程。

第二,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代被确认的民族有56个,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部族)演进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与中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各民族都有以自己为主线的发展史)基础上的融合发展是构成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居住分布最广的民族,汉族的发展对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汉族有着十分漫长而从未间断的发展史,而汉

族得以以现代如此强大的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华夏民族是汉民族的主源，但华夏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与蛮、夷、戎、狄诸族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在古代中国成为传统的“夷夏观”并不是唯种族血缘论的，文化的标准在辨华夷时占有主导性地位。秦汉的统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也促进了汉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融合。汉民族自形成后保持了不间断的自立发展史，并大量融合了其他民族人口，同时融于周边其他民族的汉族人口也有相当数量，正是这种双向融合的现象，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一般来说，中国其他民族的自立发展和民族融合往往会曲折和复杂一些。史料的缺乏妨碍了后人对少数民族发展史的认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道路也是十分多样化的。一些民族流动性大，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的程度深、规模大，不少曾显赫一时的民族的自立发展史未能长期延续；一些民族则很少迁徙，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也少，不少民族发展缓慢而延续。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属于前一种类型，而众多热带、亚热带丛林农耕民族往往属于后一种类型。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在中国边疆地区，还有一种民族现象也很普遍，这就是跨界民族的存在。形成一个民族跨界而居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我国，许多跨界民族是在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跨界民族现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国家。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中国边疆地区不但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最悠久的历史，而且其发展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中国古代文明最早是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以北、以南这两个大方向上（包括东北、西北和西南）存在着游牧民族和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的农业民族。扩大了中原地区构成了发展中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之中心地区，其外则是广阔的边疆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与边疆地区交往不断（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政治辖治或战争），中国边疆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曲折发展，在面临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即帝国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演进的，即使是来势凶猛且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了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中国边疆问题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醒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再次兴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作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这类矛盾包括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制约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制约的矛盾、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辨析这些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现象的前提。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不同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运动又有其特殊性，辨析这些边疆特殊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发展现象的关键。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往往体现为上述各类矛盾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多重矛盾的叠加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对辨析矛盾线索脉络和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来说都增加了难度。

三、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

秦帝国完成一统，为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奠定了总的格局，即长期存在一个较稳定的中原地区，与此相对的是存在广阔的周边地区，以中原地区为基础，中华民族向天然疆界之内的边远地区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外部，形成了以天然疆界为基础的传统习惯线。这条客观存在的传统习惯线，到了近代，成为正式划定国界的基本依据。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界，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疆界，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疆界。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历

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实行有效的管辖。

边疆政策的基本目的所在，概言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多种手段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边疆政策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其重要方面包括陆疆政策与海疆政策，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治边政策；历代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之一的传统治边思想等。

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边疆政策既各有特色，又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现对汉、隋唐、元、清诸朝的边疆治理和边疆政策试作概述。

（一）汉朝的边疆政策

第一，根据不同的边疆形势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两汉王朝时期的边疆分布着众多的边疆民族，由于汉王朝对这些民族的统一方式不同，各民族和汉王朝的关系也存在亲疏的差别，因而汉王朝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汉王朝的边疆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设立郡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并将郡县制推行到了边疆地区，汉王朝继承了这一制度，在北部边疆、东北边疆、西南边疆，以及南部边疆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郡县，诸如在东北边疆地区设立了玄菟郡、辽东郡、辽西郡等。这些郡县不仅管理边疆地区的民政，而且管理该边疆地区的防务。二是设立属国，管理内徙边疆民族。汉王朝统一边疆地区的时候，有一些边疆民族脱离其民族主体而迁徙到了内地，为了管理这些民族，汉王朝设立了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但其内部事务仍然由该内徙民族的酋长负责。如西汉王朝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即设立了匈奴五属国等。这些内徙的民族，一方面成为汉王朝直接管辖的臣民，同时也成为汉王朝边疆防御的重要力量。三是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在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管理的边疆地区，汉王朝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如西域都护府是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辽阔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管理机构；护乌桓校尉则管理着活动于东北边疆地区的乌桓、鲜卑等民族；使匈奴中郎将主管北部边疆地区的匈奴；度辽将军府则是从西域到东北整个北疆辽阔地区的管理机构。这些专门性机构的长官既是汉王朝派驻边